



何以中国 寻根仰韶



本报记者 刘书芳

灵宝古八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我们可能都在思考，何谓华夏，何以中国？黄河文化根在哪里？华夏文明源自何处？华夏民族如何形成？最早中国成何何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又从哪里探起？随着对仰韶文化遗址的不断挖掘和对仰韶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问题的答案在一步步揭开——

一、各地专家学者怀着朝圣心态走进三门峡

前不久，一年一度的全国性盛会——仰韶论坛召开。全国各地文物、历史、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怀着朝圣的心态，来到仰韶论坛永久举办地——河南三门峡。

2021年，仰韶文化发现百年。2021年10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贺信令人鼓舞。

“三门峡是我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地、命名地，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数量众多的仰韶文化遗址富集于此，成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开端。”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在2023仰韶论坛学术研讨会上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表示，三门峡仰韶村遗址、庙底沟遗址、北阳平遗址群等，共同构成了仰韶文化整体框架的关键坐标，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第一铲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仰韶文化何以成为华夏文明之根？

1921年10月，受聘于北洋政府农商部的丹麦人安特生来到三门峡渑池县韶山下仰韶村，挖下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第一铲土。经过反复研究，他推断出此地埋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宝藏。1923年，他撰写出版了中国田野考古第一本发掘报告《中国早期的文化》，认为这是一种“早期的中国人的文化”，他断定“中国文化源自本土”，并正式将此命名为“仰韶文化”。自此，穿越历史沧桑的仰韶文化闪烁着珍珠般耀眼的光芒，震惊世界。“这里濒临黄河，还有厚厚的黄土，非常适合人类生存、生活、生产。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华文明早期的发源地和发展地。”前来参加2023仰韶论坛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说，仰韶文化是分布范围最广的史前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华夏文明的基础。

三、仰韶先民已开始追求“美味”

很多人都以为，在史前时期，先民们都是茹毛饮血。其实，进入新石器时期的仰韶先民已经开始烤肉，煮饭，烙大饼，追求“美味美食”。

进入新石器时期，火的使用使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生食生活，进入熟食阶段。熟食便于消化和吸收，更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考古发现，仰韶先民已经在生活特别是饮食方面向最原始的方式告别，对食品进行加工，开始追求“美味美食”，出现形式多样的制作方式。

在这个时期的遗址上，人们发现了一些陶做的烤盘，呈算齿状，上面放食物，可以烤



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局部) 资料图

鱼、烤肉。甑的出现增添了新的食品制作方式。陶甑上有盖，放在釜上，釜中烧水，甑上蒸食，节约了时间，而且促使熟食多样化，丰富了人们生活。

郑州附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形态特别的器具。类似现在的“整”的器具就是用来烙饼的。它的上部是一个平面，下部分有三条腿，下面烧火上面摊饼。这说明中国人吃“煎饼”的历史有5000年左右。当然，起初吃的不一定是小麦煎饼。

四、彩陶之美超乎想象

不少人很奇怪，一件陶器又不如金器银器那样光鲜亮丽，何以迷倒那么多人？其实，如果深入探究，你会发现仰韶彩陶之美超出人的想象力——

2022年央视春晚现场的穹顶，正是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的彩陶花瓣纹，让全国人民更加关注仰韶彩陶花纹。彩陶花纹纹样精美，构思巧妙。那些以细腻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料的甗、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用陶器，其表面用红彩、白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图案和动物花纹。其中庙底沟类型的仰韶彩陶彩绘风格独特，以花瓣、花叶为主题。线条圆润流畅，画面规整，手法精美，反映出先民精湛的艺术创造能力。彩陶体现出反衬、连续、对称、律动、定向、简化、拆解、重组与象征等原理，不仅充分发挥了色彩的能量，也使得彩陶构图井然有序，图案精致凝练且富有动感，特别是象征手法的应用更是赋予彩陶以灵魂。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成熟的彩陶艺术，表明当时应该有比较成熟的艺术理论，有一流的艺术家，创立了完备的艺术原理。仰韶文化彩陶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块丰碑。彩陶一脉相承的艺术传统，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

五、彩陶花瓣纹揭示华夏民族的形成原因

中国现代考古学不仅让你惊叹古代先民的聪明和智慧，更用丰富的考古发现，揭示华夏民族的形成原因。有权威专家认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仰韶彩陶的这些花瓣纹有关——

专家们认为，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其绚丽多姿的彩陶花纹，掀起了中国史前壮阔的艺术大潮，开启了华夏族群浩浩洪流的先河。它是华夏子孙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绚丽多姿的彩陶花纹反映出当时人们高超的手工技术和充满浪漫色彩的丰富想象

力。庙底沟遗址的花卉图案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庙底沟类型”遗址中出土的众多彩陶图案中，最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变体花瓣纹，说明当时人们对花崇拜，将花作为当时部落的图腾，把花的形状画在陶器上，以便使他们的后人识别，用以施福和保护自己的后代。“华”字古代就有花朵的意思，因此，以“华”为族名，“华夏”与“中华”名称里“华”字的源头，从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便可揭开这一谜底。

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的区域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最核心区域。这个艺术浪潮的内动力，是彩陶文化自身的感召力。通过彩陶文化的传播实现文化趋同，从而促使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大范围文化认同。这种高度的文化认同，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文化意义的早期中国是这样形成的

其实，不仅华夏民族的形成与仰韶文化的影响有关，而且早期中国核心区域也与仰韶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研究室主任李新伟认为：“把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各类纹饰分布范围叠加起来，就获得了一张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的整体区域图，这张分布图覆盖的范围，向东临近海滨，往南过了长江，向西到达青海东部，往北则抵达塞北。庙底沟文化彩陶如浪潮般播散，彩陶所携带和包纳的文化传统，也将这广大区域内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了一起。这个范围内的人们统一了自己的信仰与信仰方式，为历史时代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庙底沟文化时期，也许正经历着华夏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融合。探索中华文明之源，最直接的起点，就是庙底沟文化。”这里所说的庙底沟文化就是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

庙底沟时期的仰韶文化浪潮几乎席卷大半个中国，而这与已知的商代政治地理范围有惊人的相似。专家推断，仰韶文化的影响在地理和文化上为早期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期历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义》中就西周初年“周召分陕而治”一事时说：“所以分陕者，国中也。”“陕”即今天的三门峡。庙底沟在三门峡市区，有人以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的不同时期传播影响区域作同心圆，最大圆所覆盖区域正是早期中国核心区域，其中圆心就是今天的三门峡。所以班固称陕为国中，是有一定道理的。

七、庙底沟遗址的发现使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

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庙底沟遗址的发现使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井然有序，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提供的实证。

仰韶文化发现以后，在山东章丘的龙山遗址又发现了龙山文化，特别是在河南各地发现了很多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但又有河南特点的同时期文化，考古界把它称为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过渡和发展为以后的夏文化。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属于中国新石器时期文化的重要阶段，仰韶文化又如何过渡到龙山文化呢？人们在苦苦思索、孜孜以求。因为这关系到中华文明是否连续。70年前，在三门峡市区庙底沟遗址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则把仰韶和龙山这两个时期的文化承接起来，第一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传承有序、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庙底沟二期文化也充分说明，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根基，是早期中国和华夏文明的母体文化。

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选三门峡西坡仰韶文化遗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用考古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为世人所瞩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重点对象何以首选三门峡西坡仰韶文化遗址？

我们常常自称“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炎帝和黄帝的活动时期，炎黄两大部落融合发展时期，正是庙底沟类型的繁荣时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的起止年代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几乎涵盖了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的整个时期。三门峡西坡遗址作为典型的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的代表，自然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遗址名录。在这些遗址名录中，西坡遗址名列第一。后来北阳平遗址群发掘，也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个遗址处在黄帝铸鼎原区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山海经》，以及中国二十四史的《史记》都记载了此处大量的炎帝、黄帝活动痕迹，特别是黄帝的重要活动。

西坡遗址和北阳平遗址多次发掘，取得了很重要的考古成果，发现了聚落环壕、特大型房址、大型墓地出土玉器和较为完整的排水系统，其中最大的房址F105外带回廊，总面积达516平方米，是迄今所见中国史前最大的单体建筑，开创中国回廊式古典建筑先河。

有人认为这里是黄帝都城所在，并根据考古成果划出都城范围、宫殿位置及都城的各种功能区。

这里被作为中华探源工程中黄帝文化最重要的考古区域，对探索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特性、进程、模式、动因等具有重大意义。

九、仰韶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华夏文明，根在仰韶。仰韶文化不仅仅是仰韶村一村之文化，更是早期中国和华夏文明的母体文化。仰韶文化遗址遍布大河南北。仰韶文化的辉煌是华夏儿女的骄傲，仰韶文化的成就使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仰韶文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上承裴李岗文化，下启龙山文化，表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在与其他同时代文化交流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的彩陶艺术，表现了突出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以其绚丽多姿的彩陶文化，掀起了史前波澜壮阔的艺术大潮，开启了华夏族群浩浩洪流的先河，形成深度的文化认同，在华夏民族和早期中国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表现了突出的统一性和和平性。

灵宝古八景共涉及名人历史遗迹5处、自然风物3处，二者巧妙融合，相辅相成，蔚为大观。

老子故宅

《灵宝县志》载：“老子故宅在城西北一里，治城为隋时所建，则老子故宅必始于唐无疑。”由于老子在此著书立说的成就，后人便在县城建宅以示纪念。据司马迁《史记》载：“孔子往问礼焉。孔子退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知其能乘风云而上天，今见老子，其犹龙乎！”故后人立碑以明志。如今，石碑和故宅早已荡然无存。

关龙莲墓

位于函谷关镇孟村西原上。《中国人名大辞典》载：“(夏)桀为长夜之饮，龙逢常引黄图以谏。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言矣’。于是焚黄图，杀龙逢。”旧《灵宝县志》上曾记有古人称赞他的诗句：“丹心碧血垂青史，浩气忠魂贯日光。”关龙逢以他的满腔热血，树千秋楷模，标万世风范，世世代代为人民所敬仰。

桃林牧豎

桃林，指古代的桃林塞，在今函谷关至陕西省潼关县一带。由于灵宝古称桃林县，桃林塞在古代与函谷关齐名。《纲鉴易知录》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曾用了一批夔牛参战，伐纣胜利后，便“放牛桃林之野，倒载干戈，包之虎皮，车甲鲜而藏之府库，示天下不复用”。所以，灵宝老城西南15里有一牧豎岭，桃林牧豎一景即在此。

秦岭雪樵

秦岭巍巍，横亘灵宝，秦岭的雪景很是壮观，还有樵夫担柴下山。此景歌颂了秦岭樵夫敢踏乱峰、有如青松傲雪的崇高形象。有人赋诗曰：“终南草树入桃林，樵子攀援雪后寻。”

项城暮雨

位于五亩乡项城村，《灵宝县志》称：“项城村后，石崖陡峻，水从山上而下，激成瀑布，望之成雨。亦胜景也。”清代诗人初元方在此写下了“荒村名以项城标，星厄寒流锁寂寥。不任重瞳垓下泪，至今洒作雨潇潇”的诗句。

汉庙古柏

位于五亩乡项城村对面里村北边的鳌疙瘩上，《灵宝县志》载：“汉庙古柏在秦山之尾，有汉高祖庙与项城隔弘农涧，项城在涧东，汉王庙在涧西，盖因项羽入关时与汉兵相拒于此，后项羽败，土人于此立汉王庙，中有古柏，年久荫广。高祖庙左右柏树数百株，皆首东向，与他树异。”

函谷鸡鸣

位于函谷关镇王垛村，周代在此设有关卡。春秋战国群雄争霸时，秦派兵据守。此关临弘农涧，背依秦岭山。秦法规定鸡鸣开关，日落闭关。孟尝君“鸡鸣狗盗”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今鸡鸣台犹存。

弘农晚钓

《灵宝县志》载：“城西北二里为秦岭抵黄河之处。亦为弘农入涧之处。每至夕阳返照秦岭尽处，峭壁之影照入黄河，远望如渔翁垂钓，天然胜地，故列入八景焉。”(姜涛)



乡土文化，是一个充满情感和历史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更是一个地域、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与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精神纽带。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乡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三门峡拥有丰富的乡土文化。这里的民间艺术、民间习俗、传统手工艺等，都是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瑰宝。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这些传统的乡土文化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年轻一代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逐渐减弱，他们更倾向于追求现代生活方式。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传统的乡土文化元素也日渐式微。

笔者认为，乡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政府应加大对乡土文化的保护力度，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确保乡土文化的传承有足够的资源。同时，教育部门应当加强对乡土文化的教育普及，在学校教育中增加乡土文化的相关课程，让年轻一代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民间团体、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如民间艺术表演、传统手工艺大赛等，让更多人参与乡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另外，在保护乡土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重创新发展。例如，在剪纸艺术中融入现代元素，或在现代艺术中融入剪纸元素，创作出更具时代特色的作品；在陕州锣鼓书表演中加入现代歌词和时尚元素，使其更具吸引力……

无论我们在何方，都应铭记自己的文化根源，珍视那些独特的乡土文化印记，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让它在新时代继续繁荣发展。

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

吴若雨

“陶泓觅踪”澄泥砚文化遗产寻访活动系列报道

唐宋皆贡品 砚史留美名

夏泽辉 张琦

日前，“陶泓觅踪”澄泥砚文化遗产寻访活动走进三门峡市博物馆。三门峡市博物馆位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陕州故城遗址内，馆藏文物1.5万余件(套)，是一座集文物收藏、陈列展示、科学研究、社会教育与文化交流诸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作为地方通史展示的博物馆，该馆专题展出了许多三门峡地区考古出土的砚台文物，以澄泥古砚与魏石砚居多，这也印证了三门峡在唐宋时作为澄泥砚产地的历史。另外还有一些从社会上征集来的、社会人士捐赠的澄泥砚藏品。

唐宋时期，三门峡地区产的澄泥砚是贡品。这在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明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民国二十五年《陕县志》中皆有记载。2018年，市博物馆在基本陈列“崤函古韵——三门峡古代文明展”提升改造时，特设“弘农陶泓”古砚专题陈列，分为赏砚图、各时期砚瓦、砚铭展示三部分，共展出古代砚台二十六方。其中有一方1985年出土于三门峡氧化铝厂工地的唐代澄泥砚十分珍贵。

“该砚长9厘米，宽6.5厘米，高4.9厘米。砚盖中央刻龟甲纹六边形图案，周围刻有八卦符号，仰头远视，四足着地，腹部前低后高，遗有墨迹，整方砚台神态生动。”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张峰介绍，“市博物馆共藏龟形澄泥砚两件，另一件被外地的博物馆借去展览。这些龟形砚台的唐代澄泥砚，应该就是三门峡唐代所产的弘农砚瓦。唐代的弘农澄泥砚瓦是贡品，也是《新唐书·地理志》中唯一检索到的贡品砚台。”

市博物馆砚台陈列专柜中展出最多的是箕形砚池砚，共有十一方，都是多年来三门峡市区在考古的唐墓中出土的。其中澄泥砚九方，魏石砚两方，可见澄泥砚在唐代使用的数量之大。箕形砚池砚又叫凤凰砚，乃藏砚者常说的唐代箕砚。宋代米芾《砚史·样品》一书曾对其进行过解读。

近年，陕州澄泥砚传承人王跃泽先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五方澄泥古砚与一件祖传的清代澄泥砚模具，捐献给市博物馆。王跃泽捐献的这些澄泥砚中，有一方为北宋“魏

州裴第三箩土澄泥造”款澄泥砚。此砚虽残，但因其款识内容丰富而尤为珍贵，款识为该砚的产地、制砚工匠及制作工艺等提供了明确信息。还有两方为清代“陕州工艺局澄泥砚王瑞造”款金螭澄泥砚，清代“卢砚”款澄泥砚。清代制砚模具则为观众了解澄泥砚的制作方法提供了实物例证。此外，展区还有一方清代陕州人马寨制砚艺人王玉堂制作的八棱墨海澄泥砚，该砚最大直径20厘米，高2.5厘米，砚堂圆而平展，无堂池之分，八角边框高起，上有花纹。底中部略凹，左边为篆书“富贵昌宜侯人”，中间为陶甗阳文“陕州工艺局澄泥砚王玉堂造”，也是晚清人马寨生产澄泥砚的实证物件。

“市博物馆‘弘农陶泓’砚台专题展区的砚台文物展品，展示了从唐宋至明清民国时期陕州澄泥砚、陕州澄泥砚在三门峡传承不断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三门峡澄泥砚在中国砚史上的重要地位。希望更多人关注研究三门峡的砚文化，也希望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早日被更多人认识。”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贾鹏表示。

“该砚长9厘米，宽6.5厘米，高4.9厘米。砚盖中央刻龟甲纹六边形图案，周围刻有八卦符号，仰头远视，四足着地，腹部前低后高，遗有墨迹，整方砚台神态生动。”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张峰介绍，“市博物馆共藏龟形澄泥砚两件，另一件被外地的博物馆借去展览。这些龟形砚台的唐代澄泥砚，应该就是三门峡唐代所产的弘农砚瓦。唐代的弘农澄泥砚瓦是贡品，也是《新唐书·地理志》中唯一检索到的贡品砚台。”

市博物馆砚台陈列专柜中展出最多的是箕形砚池砚，共有十一方，都是多年来三门峡市区在考古的唐墓中出土的。其中澄泥砚九方，魏石砚两方，可见澄泥砚在唐代使用的数量之大。箕形砚池砚又叫凤凰砚，乃藏砚者常说的唐代箕砚。宋代米芾《砚史·样品》一书曾对其进行过解读。